

##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北歐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對於在瑞典把漢學作為專門學科的建立，起了決定性作用。他一生的著述達百部之多，研究範圍包括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藝術和宗教。他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西方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字和漢語語音的演變，頗多創見。

1889年十月五日，高本漢生於斯莫蘭地區的榮徹平（Jönköping），父親是中學教師；高本漢在弟兄三人中排第二。大哥安敦（Lars Anton Natanael）作斯德哥爾摩新聞日報主編，後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弟弟希亞爾瑪（Gustaff Hjalmar Teodor）作過隆德大學羅馬法教授，後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

高本漢從小就對語言學感興趣，學過當地幾種方言。在中學時，他用方言寫過小說，並作過家鄉的方言的調查，他對於中國的興趣，也在那時開始。

1907年，高本漢入烏普薩拉大學，主修俄語。他的恩師是斯拉夫語言學並方言學家倫德爾教授（J. A. Lundell），曾研製過一套拼寫方言的語音符號。

1908年，高本漢發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記錄的特韋塔和穆村民間故事”。1909年，他又發表了“瑞南與瑞中方言的分界線”一文，並附方言圖。1909年完成學士課程，高本漢便到聖彼得堡，跟伊萬諾夫教授（A. I. Ivanov）學習了兩個月的基礎漢語。後來他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於1910年三月啟程來華。高本漢在中兩年，見證滿清的覆亡，和民國建立。獎學金用完，他靠在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教授法語和英語維生。

在中國的初期，高本漢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迅速掌握基本漢語口語和常用漢字，達到可以獨立外出的程度；隨後，他列出詳細的調查問題表，開始進行方言資料的收集與考證。1911年後的中國，正處於封建帝制崩潰社會秩序混亂的時期；高本漢打扮成讀書人人的模樣，帶着一名僕人訪問了北京，太原周圍許多地方，不僅收集到豐富的方言資料，還寫了關於中國社會革命和人民生活狀況的系列報導，寄回瑞典刊登於新聞日報。

高本漢努力收集材料，竟能在中國進行二十四種方言的記錄考察，其中包括：北京話，山西八種，甘肅三種，陝西三種，河南三種，及南京方言（以上十九種屬於北方官話系統），還有代表吳方言的上海話，代表閩方言的福州話，代表粵方言的廣州話，以及漢語借字的日語，越南語讀音。另外，他還根據已發表的材

料，收集了其他九種方言的發音。在這麼短的時間，涵蓋了如此廣袤萬裏的地區，成就可謂極其豐碩。這說明瞭高本漢有正確系統的方法，和堅忍勤勞的精神，真箇腳踏實地，不是膚淺的徒以學術標榜者可比。

1912年一月，高本漢返回歐洲，在倫敦停留幾個月，研究斯坦因取自敦煌的文物資料，隨後到巴黎研讀兩年（1912年九月-1914年四月）跟隨著著名的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從事比較語言學研究。其間，他結識了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和馬伯樂教授（Henri Maspero），並多次與他們探討，論辯一些問題。爭論促進了他對古漢語音韻系統的思考。高本漢還到過萊比錫拜訪過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6），到柏林訪繆勒（F. W. K. Muller, 1863-1930），同這些先進切磋，向他們請益。

1915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五歲的高本漢獲頒文學碩士學位。次日，是五月二十一日，再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就任烏普薩拉大學漢學講師。他的博士論文為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其中1—338頁部分，倫德爾主編的東方研究文集（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第15卷。因他傑出的論文，銘文與美學研究院於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獎。

1916年到1918年，高本漢在利丁厄（Lidingö）的宣教士學校教授現代漢語。1918年，受任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學和文化教授，這是為他特別設立的新職位，由私人捐款贊助。他保持這職位直到1939年。

1922年三月到十二月，高本漢第二次到中國旅行，還訪問日本。這是他最後一次在中國逗留。

1931年到1936年，高本漢任哥德堡大學校長。1939年，高本漢任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兼東亞考古學教授，他兼承此二職直到1959年，達二十年之久。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邀他主講斯坎的那維亞漢學家講座時，他屬意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講授，這項工作一直進行到1965年。此外，他還擔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長，瑞典皇家學院和丹麥皇家學院院士。

高本漢一生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培育漢學家的工作。學術研究主要涉及漢語和考古學領域。他寫了許多介紹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著作，都成為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大學漢語專業教材。他的學生有許多後來成為傑出的漢學研究者，執教挪威，荷蘭，丹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各大學。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範圍比漢學更廣，但漢學家們的興趣，大都集中在中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和宗教方面，因為在語言學方面，表面的枯燥，缺少引人的地

方，所以沒有能夠鼓勵起同樣的研究高潮，而他則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情有獨鍾，因為漢學比任何別的科学，需要語言學的地方更多。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高本漢認定目標，一心一意，規畫並從事他的漢學研究。早於1917年，他在瑞典人文學志（*Svensk Humanistisk Tidskrift*）上發表了一篇宣言，鉤畫了“漢語語言學家”在以後應該從事的工作。1920年，他發表題“原始漢語是屈折語”（*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的論文（*亞細亞雜誌*，15），其中揭示了上古漢語有代詞的格屈折變化痕跡。這篇論文是高本漢用法文寫的最後一系列論文之一篇，引起了轟動。

此後，高本漢轉而用英文寫作。多年來，他不止一次的轉向漢語中的屈折和派生問題：1933年發表了“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 BMFEA*, 5），以及後來發表的“漢語語音系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 BMFEA*, 28, 1956）。

關於中古音的構擬，高本漢於1923年出版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本書成為整一代漢學家的主要工具書，直到1940年他的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nica*）所取代。1926年，中國音韻學研究完稿，其最後部分為方言字匯，也就是三千一百個單字的方言讀音表。從此，學術界便可以享受高本漢的辛勞成果，使用方言調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

高本漢很早就對古籍考證，辨偽非常有興趣，此類著作的第一部，是1926年論左傳的真偽和性質（*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接着1929年發表“中國古籍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BMFEA*, I）。他所採用的方法是：根據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詞語的性質和古籍語法特徵的內證，對古籍作出判斷，發現真間的差異。他還寫了詩經研究，老子韻考，漢語詞類，頌詩韻考等。由於以語言學為基礎，他的考證方法為中國的音韻研究，古籍辨偽研究，開闢了科學化的道路。

高本漢在哥德堡大學期間，出版了幾部流行頗廣的入門書，和通俗讀物。1918年出版的北京話語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1923年用英文寫的漢語語音與漢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1929年的簡述中國思想界，都值得一提。他還寫了幾部歷史著作：十九世紀的東亞（1920）中國，日本（1928）。還有宗教史著作：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 1924）。

1940年以後，高本漢對中國兩部最古的典籍書經和詩經進行了徹底分析，並作了大量的注釋，同時根據嚴格校訂的中文本，

將其全譯為成英文出版。他還把詩經，全部寫成現代標準漢語，並以構擬的上古音標，全部注出其韻字。詩經詮注連載於 BMFEA 1942-1946，共 673 頁；書經詮注刊登同一刊物 1948-1949，共 419 頁；詩經和書經的校訂本刊登於 1950。許多年後，高本漢作了左傳注釋匯編 (BMFEA, 1969-1970)。

高本漢把古代真正可靠的文獻，分成系統化的和非系統化兩類：其中一類是試圖描述各個時代情況的著作；另一類另有其目的，但順便提供了宗教和社會情況。他把重點放在後者，視之為原始材料。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古代中國的傳說和原始宗教”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18, 1946)，這是一篇艱深的長篇大論，包含大量可靠的已有論證的材料。後來他又寫“周代中國的祭禮”(BMFEA, 40, 1968)。1964 年起，還用瑞典文寫了較通俗的“中國宗教：經典的古董”(Religion i Kina: Antiken)。

晚年的高本漢，深入研究古代經典，部分成果關於詞彙。他把觀察的結果，收集在“漢代以前文獻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 I-V, BMFEA, 1963-1967)，後又編寫了“漢語典籍詞彙拾遺”(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 I-III, BMFEA, 1972-1974)，還有“老子注”(Notes on Lao-Tse, BMFEA, 47, 1975)“莊子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 BMFEA, 48, 1976)等文。

高本漢的語言研究，也產生了關於語法的論文，刊 BMFEA, 23 (1951)，24 (1952) & 42 (1970)，並詹生 (Arthur M. Jensen) 紀念論文專集 (1961)。他對漢語發展任何階段的語法，沒作過全面描述，但提供了許多準確的，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對確定作品真偽，前後是否一致，常為重要的。

在斯德哥爾摩期間，高本漢就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寫了幾本通俗書：漢語 (1946)，中國語與中國文 (1948)；還有兩本入門書：漢語入門 (1948) 和漢語文字簡易課程 (1958)，頗受大眾歡迎。

高本漢的治學範圍，兼及青銅器的研究，開始自 1934 年，最初考察青銅器上的銘文，寫了“早期中國青銅鏡銘”(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 見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第十二期)，以後又寫了一系列文章，論證有關青銅器的年代，分期與出土地點等，包括：“淮和漢”(Huai and Han, BMFEA, 13, 1941)“早期東索恩文化的年代問題”(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 BMFEA, 14, 1942)，“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MFEA, 17, 1945)“遠東文物博物館中的新銅器”

(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24, 1952) 以及其他論文。還有他對匹茨堡 (Alfred P. Pittsburg) 收藏的中國銅器進行研究編目：皮茨堡收藏中國青銅器目錄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P. Pittsburg Collection)，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 (1952)。他最後的考古研究成果是“中國古鏡” (Early Chinese Mirrors, BMFEA, 40, 1968)。

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是高本漢構擬中古音的代表作，陸續發表於 1915-1926 年間，經整合成書，影響極大，標識着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

此書除“原序”，“緒論”和附“所調查方言地圖”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漢語；第二卷現代方言的描記語音學；第三卷歷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匯。實際上講了漢語語音史概論，現代方言研究中的描記方法和歷史語言學研究中的共時描記，解釋方法，方言字典編纂學和方法。本書是以中古音構擬為基點漢語史，高本漢全面利用現代方言資料，正求中古語音系統，進而由中古音系推證上古音系，並分別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語音構擬。

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高本漢一方面參照宋朝 (960-1279) 及以後歷代韻表，一方面又根據廣韻 (1007 以後) 中的反切，把三千一百個漢字排列成表。他比較了這些字在現代各種方言的讀音，構擬出其音值，把這些已知的音值插進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準確的方式，斷定古音類別和各個字的古讀。

高本漢並沒有結束中古音研究，更沒有結束由此上推古音，下證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現代科學方法，引進了傳統音韻學，在現代方言調查這座大鏡台前，映照中古音聲韻系統，並首次構擬其音值，為上推古音，下證今音，不僅在方法上，且在音值的精確度上準備了條件。

作為一部重新構擬古代漢語語音系統的奠基之作，中國音韻學研究被國際漢學界推崇。這部著作於 30 至 40 年代，由中國語言學家羅常培，趙元任，李芳桂譯成中文出版，在翻譯中，三位學者加了注釋和補訂。趙元任受其啟發，創立了我國第一套羅馬拼音字母方案。羅常培高度評價高本漢對我國語言學的貢獻：“這部書不但在外國人研究中國音韻學的論著裏是一部集大成的工偉作，就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音韻學通論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偉著…照比較語言學的眼光來看，這種構擬的價值是相當高的。所以，我們對於高本漢所得的結果，一方面要認清是用可靠的科學方法構擬出來的，同時也得承認這種構擬的讀音，對於研究中國語言史學有很大的幫助” (羅常培：“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載圖書月刊第一卷，7, 8 期)。語言學家王力曾指出，中國語言學家受高本漢影響很大，“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甚至接受了他的觀點，方法” (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1）。

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於1923年在法國初版，在內容上由序論，上古音，中古音，現代北京話發音，漢字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說明構成。在書中，作者對於上古漢語（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600年）的音韻，提出重要的假設，例如：從具有共同的諧聲成分的漢字系列中，得出結論：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之間這階段的某一時期，一些字的濁塞音聲母（b, d, g）和另一些字的濁塞音韻尾失落了。此書是整一代漢學家主要的工具書。

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高本漢的學術生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期達到了最高峰。在完成中古漢語研究後，就開始向上古漢語攀登。從1923到1934年，陸續發表了中日漢字分析字典，“上古漢語問題”，“詩經研究”，“漢語詞族”等重要著述，大體完成了古漢語的構擬。1940年，高本漢把研究成果以字典形式編入古漢語字典。

此書的編排非常清楚，使用方便，具有同一諧聲成分的漢字都排在一起。漢字的字形，從甲骨文到銅器銘文和碑文，再到現代字體，按年代順序標出。漢字的詞源意義，凡是認為確鑿無疑的，都標出來了，而傳統上比比皆是憑空設想的，不可靠的詞源，則全部摒棄不收。所收漢字在漢朝以前書籍中出現的意義都注出了了，並注明出處。每個字都標出三個階段的讀音：他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中古音，和現代官話讀音。

1957年，高本漢又出版了古漢語字典修訂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其中增加了他對最古典籍所作的注釋，增標上了字調，如此更能體現高本漢的研究特色。

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早在四十年之前，就已經出版中譯本，而古漢語字典的中譯本，則遲至1997年，才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如果說中國音韻學研究是高本漢關於中古漢語的傑出論述，那麼古漢語字典，就是他畢生研究上古漢語的結晶，其中匯集了他全部語言學，字音學研究的豐碩成果，在學術上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 高本漢的弟子馬悅然 古漢語字典在音韻學上的價值

首先，此書是對於漢字注音的獨創。迄今為止，在我們所見到為數不多的，能夠標明上古音和中古音，直接可以讀出音值的古漢語辭書中，應該古漢語字典為第一部。不僅如此，幾百年來，漢語字典的編寫者，總是輾轉傳抄漢字的各種讀音，而從不問這些讀音是否來自同一語音系統，於是古今的南腔北調往往糾纏混雜，使人無所適從。而高本漢則用了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和唐代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兩書相距不到三十年），對所收漢字的中古音嚴加審辨，從而保證了這些字的讀音，都來自中古同一語音系統，在此基礎上，進而確定的漢字的上古音和現代音。

古漢語字典在音韻學上的價值，還在於大致上正確反映了漢語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語音體系，以及從上古音到中古音，從中古音到現代北京話的演變軌跡。從音韻學上來說，更重要的是高本漢此書所反映的音韻理論。他替一部分漢字的上古音，構擬了複輔音聲母，這種構擬，具有漢字諧聲系統和漢藏語言比較等大量證據，現在已為大多數音韻學家承認。

### 古漢語字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

首先在於此書嚴格區分了字的本義和詞的本義。中外學者常誤以為字的本義就是詞的本義，其實，兩者往往不能相合，特別在表示抽象概念的時候，更是如此。

此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還在於其嚴格選取只出現在漢代以前典籍中的詞義，而不取只出現在說文等字典辭書中的詞義，和漢代以後的詞義，這樣，漢語語詞的本義，引伸義和假借義，就顯得特別可靠和明確。

此外，高本漢對於詞義的考證，有許多不同於中國辭書的地方，顯示了他獨到的見解。

### 古漢語字典在文字學上的價值

高本漢晚年，對於中國的古文字，古器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此書中就有他許多獨到的見解，可供文字學研究參考。

### 古漢語字典的不足和錯誤

首先，在音韻學上，古漢語字典曾經遭到董同龢，陸志韋，王力等的深刻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古韻分部問題上。其次，在訓詁學上，對於古代詞義的理解，訓釋，還是有一些失誤。

從總體上說，其缺點錯誤畢竟屬於少數，而且這些並不妨礙此書仍然成為當代古漢語研究中的一本極具價值的重要文獻。

### 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於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是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作描記，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在漢語音韻學方面，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研究，並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記，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闢一條新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這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 所用材料

在重建中古漢語語音的時候，高本漢主要運用三方面的材料：

一是韻書和韻圖，二是漢語方言，三是外語借詞。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漢主要利用了詩經押韻和漢字諧聲原則，並根據自己構擬的中古音系（切韻音系），應用“內部擬測法”，以構擬音類的音值。這個概念，出現於二十世紀的30至40年代，在結構語言學興起之後，將共時語言結構的分析，用於語言演變的研究的一種方法，但它的實際應用，則見於高本漢漢語上古音的研究。其成果分見於前述不同著述中。到1940年，高本漢將這些研究成果總結，凝聚，寫進古漢語字典。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是對中古漢語語音研究的結晶，古漢語字典是對漢語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記，在中國語言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將這種方法，用於漢語音韻史研究，取得了顯著成效，並已被中國語言學家廣泛接受。

### 高本漢與中國語文應用分析

漢學研究是十九世紀在西方興起的學問，以求對中國的文學，歷史，及文化，作科學的，與系統的了解。

歐洲對中國語文的興趣，大約在十四五世紀開始。但作系統的研究，應該是宗教改革後，算是由宣教士開始的。

美國第一位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是在華研究漢學有成的拓荒者，只是他專心傳道著述，未使漢學發展成為一個專門學科。

後來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來華，從裨治文學中文，因為他聰明，由學徒而成為叢報助理編輯，而主編。後來他充任美國使館翻譯。1877年，回國任耶魯大學首位漢學教授。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英國聖公會宣教士，在香港宣教並創辦英華書院。1873年返國，任牛津大學首位漢學教授。

不過，初始的漢學，是文學與語文在一起的，連在中國也沒有成為嚴格的科學。到十九世紀，考古人類學流行田野考察，語文研究也進入方言調查，成為語文分析的基礎。

二十世紀初，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雖然其生也晚，到二十世紀才從事學術研究，卻是為西方現代漢學研究，奠定了根基，培訓人才，向前大步邁進。

高本漢對於漢學的研究，可謂博大精深。他對尚書，詩經，左傳，中國青銅器研究，古鏡，都有研究專著，對於中國語文歷史和聲韻變革的研究分析，稽考古籍，廣泛而系統的研究，更超越華人學者的成就。

高本漢著有中國語與中國文，是基本的入門書，但有精到的分析和創見。他指出：古漢語有2250音，因此，今天看為艱深的古文，如果讀給古人聽，他們就容易懂得多。現代國語或北京



話，只有 420 音，同音字自然就多了；而廣東話共有 900 多音，同音字就相對的減少，但比起古音，還是有所不及。如果現代人把詩經朗誦給原作者聽，任他用標準北京話，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原作者還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今天我們看來，如果依從前人提倡中文拼音拉丁化，不僅糟蹋了美好的文字，也造成許多的混亂和不便。何況今天電腦那麼普遍，寫字不再成為問題，像英文打字一樣，按鍵下去，字就會出來，繁簡並沒有差別；只是中文比英文打得更快。

### 南腔北調

秦始皇雖然統一了中國文字，但中國幅員廣大，族群多，各一自己的方言族語，使用文字自然難以完全一致。

北方人稱“南蠻馱舌之人”，是因為字音多，學來困難；南方人譏笑“北鄙貊夷之聲”，雖然是說子路的音樂不高雅，但北方人語言也多濁重，不如吳儂軟語委婉中聽，確是事實。

同音字既多，書寫易於分辨，說話就聽來困難了。我們不要忘記，對於從前的人，說話比書寫更重要，因此，必須有以救濟。

### 量詞

多年前，不記得在那裏，讀過趙元任的一篇短文，講到同音“一”字之多：“怡姨疑疫詣邑醫以蟻抑宜已矣…”；還有：“石室史氏誓食十獅拾矢駛視…”；大意如此，當然，會可以加上許多，如“實是時事”之類，不過，這已經夠了。

這多的同音字，聽來像什麼話，自然十分難懂。如果說：“一位怡姨”，或“十隻獅子”之類，加上量詞，就可以解除了解的困難。

量詞有助於了解，但也要正確使用。北方話字音字少，所以得多使用量詞，也講究量詞。南方字音多，量詞的發展就較不重要。

比如說：“一對鞋子”，是南方人說的，北方人說：“一雙鞋”。如果說：雙親，一雙父母，父母雙全，是正確的；雙雙對對雖然意思相同，但比較尊重的說法是“雙”，“對”則一般不大好。如：儷影雙雙，一雙璧人，是好的意思；水滸傳說：“一對狗男女”，當然不是好話。

如果問人家“有幾位男女公子？”是敬語。在回答的時候，說：“我有二位兒女。”就不對了。太自敬，即是抑低對方。

又如：“一間教堂”，絕不是“一間教會”。其實，教堂也不應該說“一間”，正確的說法是“一座”，裏面可以分為許多房間，如主日學教室，廚房等；教會是信主的人集合在一起，集合稱是“一個教會”，量詞混用，不僅語意不對，還可以造成信仰錯誤。

### 對稱

另一個幫助了解的方法，是使用對稱。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見創造者的匠心。”雖然省去量詞，也不會誤意，反有簡潔清新之感。如果說：“一父一母”，絕不會給人誤會是“一釜一畝”，這是習慣上對稱的好處，聽的人聽了上面一半，自然會預期下面相對的語詞，才算完全。這樣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有時我們不自覺，但幫助了解很重要，如：父子，兄弟，姐妹，水火，多少，上下，左右，俯拾皆是。

新發展的語詞，好像忽視對稱。如：“質”與“量”相對，是由來已久的事；如果都換上全詞，應該是“品質”與“數量”。今人用“數量”與“質量”對稱，是不對的，實際上“質量”不能作一詞用。

同樣的情形，是習用的“宏觀”與“景觀”對稱。正確的使用，“宏觀”應該與“細察”對稱，以“景觀”表示局部，難以適合。

### 聲韻

還有一個解決同音困難的方法，是有不同的聲韻。現代國語或說北方普通話有四聲。雖然學來麻煩，原來卻是為了解決麻煩。例如：馬，媽，罵，麻，即使不加量詞，也沒有誰指麻為馬，或稱“馬：”為“媽”。

變音或破音字的應用，常使現代說的人困擾，但起初原是要減少困擾的。最常見的是“那裏”。說：“那裏”，是肯定的指示 statement；而說：“哪裏”，是不肯定的；還有“哪裏，哪裏！”你知道是什麼意思。

還有“傾倒”是倒下來；但“傾倒”（讀如“到”）成了倒出來；至於“為之傾倒”，則是傾服了。

### 雙聲疊韻

經濟是文字的優點；在古代書寫材料困難，傳播困難的情形下，更應該如此。但我們知道，經濟原則不僅指用錢少，用字少，更是用必要的最低資源，達到最大的效果。這原則，值得我們另作普遍深入的研究應用。

現在我們只說在語文方面。

“清”，“輕”分不清，說“清潔”，“清白”就得了，不會給人誤會用“情”，或看“輕”。“祈求”不會混成“器”或“氣”。

“清潔”不是“情結”，也不是“情節”；如果再怕誤意，可說“清清潔潔”，“清清白白”，表明其不貪污，不苟且，也道德上的應用或衍用。當然，要加強語氣的時候，也可以用疊詞：這是“實實在在”的話，已經盡我所能，說得“明明白白”了。

中國既有這麼深厚豐富的語文遺產，再加上成語，習用的典故，應該很夠用了，只希望我們能好好發揮。

### 現代漢語的問題

語文是構成文化的重要部分，自然像社會結構一樣，隨着時間改變。在一般情形下，改變的觸媒是文人的寫作。只要翻開較全備的字典，或辭書，就可以跡尋改變的軌跡。近代傳播，廣告，翻譯，都有些反傳統的傾向，原因是喜新好奇，或為了引人注目；說了不好意思，有的人以為洋理洋氣，可以提高身分。自卑感作祟，可憐！

“委身”一詞，近來在宗教上的廣泛應用，可能是起源於天主教的修女們，他們求自我慰藉滿足，情感上的“轉嫁”作用，所謂“嫁給基督”的說法。我們且不要遽然定罪，該當作是一項信仰誤差：在舊約時代，以色列國集體的是神的“新婦”，包括個人而不適用於個人；在新約時代，教會是基督的“新婦”，個別婦女，不論已婚，未婚，或寡婦，都不能稱為基督的“新婦”。至於以“委身”取代“奉獻”，那是忽略歷史背景的結果；因為“奉獻”是獻給神，在壇上焚燒，這種意象，是不應該以別的語詞代替的；除非你另有立心，改變信仰，或改變別人的信仰。

近來遇到一個孩子，他高興的說：“我是五歲！”說的是字正腔圓的漢語，但卻是外國漢語，不是中國話；中國話只有：“我五歲了！”也可以說：“我今年五歲！”

還有一個使人傷心的洋漢語，當然文化界是始作俑的輸入者，未經消化就大加推廣：“這就是為什麼。”原來是“This is why…”其實，並沒甚奧妙，也不會提高說者的身分，該說：“因此”，或：“為了這個原因”，或說：“原因在此”。但有人偏選擇不道地的中國話，真的不知為什麼。多年前，趙元任先生提倡：“話怎麼說，就怎麼寫”，是語文的簡單原則，可是好像沒有多少人注意，也許因為非洋人說的吧！但我希望現在仍然適用。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